“五四”前后国学研究学术思想的新变（下）

◯ 刘石

刘石

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87年硕士毕业，1991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古典文献学。著有《书法与中国文化》、《苏轼词研究》、《苏轼词选》、《有高楼杂稿》、《有高楼续稿》、《中国文学作品选注（宋辽金卷）》等。

“审美的尺度”

前文说，近代以来，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学观着眼于救亡图存、开启民智、关注人生、改造社会，充满忧患意识和政治使命感，但与此同时，还存在另外一派以王国维为代表的相对立的文学思想。王国维受康德、尼采、叔本华等哲学思想的影响，更加强调的是文学自身的价值如审美特性和形式的独立性。他批评“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并批评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又说“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这种超功利性与独立价值的文艺观是近代维新变法后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个性自由的追求的体现。这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到了“五四”时期及其后又有进一步发展。表现在文学观上，就是重视文学的缘情审美价值。如严既澄说：“艺术的目的，本不容搀入多量的人生实用的见解”，余祥森说，要重视没有“高深思想”但“他的美妙也很能感人动人”的作品，与此同时，还重视作家本人对作品的直接影响，“文学作品是代表文学家自身”的，“文学的真价不专在片面的艺术欣赏，而在作家的内心”。

诚如学者所论，这是国故派“观照民族文学遗产”的“审美的尺度”。他们从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的特征入手，在超功利、超现实的基点上强调文学的本体，以追求文学自足性为最高旨趣，以追求文学的“唯美”特征为己任。并且，他们在强调“文学家底品性、思想、行为等等都是受时代和环境所影响”的同时，还从作者的内心如何融入作品的角度，勾画作者情感与作品的关系，强调作家本人的主观因素对作品的作用。这既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之法与“人格美”的批评标准的新用，又是“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在文学观上的显现，也是打破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现代意识。

还有学者将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重视同“五四”时期对“文学”概念的探索和界定联系起来，认为“文学”历来是个比较宽泛和模糊的概念。从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出版的《国故论衡》到“五四”学人的诸多论述，不少人试图采取科学态度，进一步将文学从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以及史学等学术中分离出来，使“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围逐步规范到诗歌、小说、戏曲和艺术散文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范畴中来，使文学进一步获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不仅是促使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朝着科学化方向迈进的基础，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对于文学艺术美的重视。王国维《红楼梦研究》、《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的研究已开风气之先，“五四”学人经过科学的讨论，就把文学的艺术的本质更加明确化了。这从胡适、郑振铎、鲁迅等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中随时可以见到。

20世纪头二十年中探索、肯定、发扬文学艺术自身价值的观念得以出现，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一个象征。由于其与中国传统政治教化的文艺观的冲突，与20世纪前半期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的不相融合，也由于20世纪后半期文艺工具论和政治庸俗化的甚嚣尘上，这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1925年）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种对文学自身价值的探究曾经蒙受许许多多的误解、曲解和非议，却从来也不曾完全消亡。到了20世纪末二十年，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到来的时候，便焕发生机，堂堂正正地大行其道，闪耀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科学的方法”问题

“五四”时期提倡“整理国故”的“科学的精神”，理所当然地包括“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路径等的自觉探求。当时人纷纷提到“科学的方法”问题。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所作《附识》中提出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整理国故，胡适1919年8月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我们若能用自觉的科学方法加上许多防弊的法子用来研究国故，将来的成绩一定更大了。”1923年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也说:“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同年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同样说:“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毛子水说:“‘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

说到“科学的方法”，绕不过最爱讲方法、最不吝为人师的胡适之先生（虽然他口头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上文提到胡适提出“归纳的理论”，其实 “归纳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方法论的色彩。梁启超在完成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就说:“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粗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

清华中国文学会委员会合影（1931年10月28日）。前排左起：朱宗英、郑振铎、刘文典、林庚，后排左起：李嘉言、李文瀛、吴祖襄、赵赓飏

清考证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历史的眼光”中同样未尝没有方法的意义。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解释“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两层说，第一步：举例时，当注意每个例发生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例排在一处，不可把《论语》的例和欧阳修的例排在一处。第二步：先求每一个时代的通则，然后把各时代的通则互相比较。若各时代的通则是相同的，我们便可合为一个普遍的通则。若各时代的通则彼此不同，我们便应进一步研究各时代变迁的历史，寻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所以革的原因”。这简直是像对学生般的循循善诱了。但胡适最为得意，在后世也最赫有声名的，是他受赫胥黎和杜威思想启发总结出的清代学者治学的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此外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系统”和“比较”两种方法。

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后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郑重而又具体地提出“注意系统的整理”的方法：索引式的整理，结帐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并设计了统属于“中国文化史”大题下“国学研究”的整体系统。虽然着眼点在“中国文化史”研究这一宏大的目标，但对于各门具体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学科的研究者系统地思考、规划、架构、整理、研究本学科，都起到了或多或少的启示作用。

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也强调“系统”的重要：“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所说的“系统”，既完全同于胡适所指，同时也指“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他在最后十年间所作的许多学术论文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年）、《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年）等，就表现出这样的系统性。他自己也颇为自得，指前文“用表情法分类以研究旧文学，确是别饶兴味，前人虽间或论及，但未尝有系统的研究”。即使研究个别作家，如《屈原研究》（1922年）、《戴东原哲学》（1923年）等，论其材料搜集的全面、结构的完整、叙述的条理化，与旧时笔记体或评点式的文字均迥乎有别。从形

式上说，它们已经完全是现代学术论文的体制了。所以说 “系统” 属于研究的一种方法，但对“系统”的追求何尝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体现，显示出学术现代化的色彩?

对于“比较”方法的强调也是如此。比较是基于人类共性的一种思维方式，贯穿于古今中外的学术研究中。拿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来说，班马异同、南北文学异同、李杜优劣、两唐书优劣、唐宋诗高下等等问题的论争，无不是建立在比较的思维上的。但这里所说的固然是一种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却又不仅止于此，同时也是在西学东渐、中西会通的新时代体现出的现代性视野和全球化的眼识。胡适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强调重视比较的方法的。他在1921年撰写《国语文法概论》时强调“比较的研究法”，除了搜集中国古文文法和中国各地方言的文法外，还要搜集“西洋古今语言的文法”如英、德、法、希腊、拉丁方法，以及“东方古今语言的文法”如满、蒙、梵、日文法等来加以比较研究。“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1923 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又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他1928 年所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从中西比较角度谈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缺陷，分析与西方学术和科学分野的原因，称得上是一篇身体力行之作。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虽然胡适尚未来得及做出像样的实绩，但当几十年过去了的时候，他所提倡的比较研究已经由一种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大的研究类型和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这恐怕是当时的胡适再“大胆”也没法“假设”到的吧。当然，这不能完全归于胡适提倡之功，而是时代发展的表现，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五四”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五四”的影响可能永远也不会过去。它以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定格于中国政治史，以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定格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开辟中国文学新纪元的文学运动定格于中国文学史，同样也将以一系列充满新时代朝气的新的学术思想和大量的学术研究新成果定格于中国学术史。如果我们回顾“五四”至今八十多年的学术研究，我们会看到它们与旧时代的学术既有着承继蜕变关系，更在动机与目标、价值取向与评判标准、思想理念与思维气度、方法与手段、领域与格局、表述语言与著作方式等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因为这些不同而成为20世纪新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五四”时期奠定下它们的基础的。

王国维

王国维手迹